

歸返、夢幻、焦慮：

從陶、柳辭賦論歸田書寫的文類流變及其創作意蘊

許 東 海*

摘 要

歸田是中國文學史上的重要書寫主題之一，也是傳統士人階層藉由文學載體展現心靈風貌與情志取向，並作為面向文學歷史、文化承傳、群己關係、人生理念等重要人文範疇的回應與投射。因此透過歸田書寫這一心靈鏡像，我們或應可從其中探索出攸關作者內在生命姿態及其自我觀照的一些重要訊息。

綜合陶淵明〈歸去來兮辭〉、柳宗元〈夢歸賦〉及其相關詩文的考證，對於由屈〈騷〉引領的歸返書寫，既是辭賦發展史上重要的傳統書寫主題之一，同時也成為後代辭賦歸返論述的原始基調。

透過柳宗元迥異於傳統歸田書寫的辭賦風貌，促使我們有必要重新審視歸田典範陶淵明作品裡的文學話語及其深層底蘊，然則柳宗元〈夢歸賦〉於此提供了重要的觀察脈絡，此外，亦進而揭示傳統歸田文學中歸返、夢幻、焦慮三者一體的創作底蘊。而藉由三者一體的特殊面向，應可為傳統辭賦文學中所引領開展的歸田書寫，重新更清晰地鉤勒出其中主要的建構質素與論述脈絡，並關涉二者間同中有異之交集與異趨面向。

關鍵詞：辭賦、陶淵明、柳宗元、屈原、歸田

一、緒 論

歸田是中國文學史上的重要書寫主題之一，也是傳統士人階層藉由文學

* 作者係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載體展現心靈風貌與情志取向，並作為面向文學歷史、文化承傳、群己關係、人生理念等重要人文範疇的回應與投射。因此透過歸田書寫這一心靈鏡像，我們或應可從其中探索出攸關作者內在生命姿態及其自我觀照的一些重要訊息。

中國文學中的歸返書寫，早在《詩經》中即出現如〈邶風·式微〉「胡不歸」的生命吶喊，同時《詩經》中也不乏如〈魏風·碩鼠〉、〈豳風·七月〉、〈王風·君子于役〉等以田園生活為主要創作素材的詩篇。¹然而這些詩歌並未出現符合後代以士文化為精神主體的歸田書寫。從今存的相關文獻來看，具備明顯此一歸田書寫的文學創作大體出現於漢代，其中張衡〈歸田賦〉即是其中的著名典範，也是後代歸田書寫的主要具體根據。後世田園隱逸詩人之宗的陶淵明倣效張衡運用辭賦文體撰寫〈歸去來兮辭〉，再現〈歸田賦〉傳統主題的精神意蘊，並從而成為中國歸田書寫的雙璧，在文學史上前後輝映。從而也揭示出辭賦在歸田書寫史的重要貢獻；其次，由張衡、陶淵明辭賦中所揭櫫的儒道意蘊，又成為後代文士歸田姿態的具體典範，似乎留予後人諦聽凝視的，是從他們身上所展現的一場完美生命轉換的演出，卻不自覺地忽略或遺忘張、陶二人在〈歸田賦〉、〈歸去來兮辭〉歸田書寫的字裡行間，所潛伏或隱喻的生命焦慮。換句話說，無論〈歸田賦〉或〈歸去來兮辭〉而言，兩者的最重要意蘊，不在昭告世人以進退準則，更值得關切的是，其中藉由歸田書寫所隱喻的重要底蘊之一，即作為一個知識份子的自我定位基礎上，面向傳統的內在心靈對話，並且藉由歸田書寫型態的文學話語，展現其置身於士文化歷史脈動中的生命焦慮。

從張衡到陶淵明完成的歸田典範中，表面上乍看如釋重負的歸田姿態，其中固然不乏灑脫與淡泊，卻又不免同時隱約交織著士人百味交陳的生命焦慮，而這樣潛存於張、陶二人歸田書寫中間的焦慮表述，在後代柳宗元〈夢歸賦〉的歸田論述裡，一一浮現而出，於是我們既詫異於柳宗元〈夢歸賦〉與張衡、陶淵明所代表之傳統歸田書寫的大異其趣；另一方面又不免重新省思於張、陶二人的傳統歸田典範，似乎不應僅僅解讀出一種生涯軌道的轉向意涵，從而輕易視同於生命軌道的翻然轉換與前後割裂。換言之，透過柳宗

1 參見余冠英注，《詩經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頁40。另參見葛曉音，《山水田園詩派研究》（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3），頁3-5。

元迥異於傳統歸田書寫的辭賦風貌，促使我們有必要重新審視歸田典範陶淵明作品裡的文學話語及其深層底蘊，然則柳宗元〈夢歸賦〉於此提供了重要的觀察脈絡，此外，亦進而揭示傳統歸田文學中歸返、夢幻、焦慮三者一體的創作底蘊。而藉由三者一體的特殊面向，應可為傳統辭賦文學中所引領開展的歸田書寫，重新更清晰地鉤勒出其中主要的建構質素與論述脈絡。同時，具體地藉由漢魏六朝時期由張衡到陶淵明辭賦所完成並確立的歸田書寫典範，與唐代柳宗元〈夢歸賦〉中所展現的歸田論述間前後作品的對讀，探索傳統辭賦文學歸田論述中的深層結構及其創作底蘊，而這一內在承傳且隱而未顯的書寫旨趣，藉由陶淵明〈歸去來兮辭〉與柳宗元〈夢歸賦〉的對讀中，亦可具體獲得發明與印證。換言之，陶、柳二人表面上看似不盡相同的兩篇辭賦，卻又前後相契地同時演繹著張衡〈歸田賦〉所引領的歸田主題，然而陶淵明與柳宗元的前後論述，雖然映現為隱與顯、常與變，……等等值得玩味深思的對照特質與風貌，而這些特色，亦唯有藉由陶、柳二人賦篇的具體對讀，方得以洞鑿發明。至於其中關涉的夢幻色彩或魂夢型態，固然承傳中國夢文化與夢文學的淵遠流長，² 並且於先秦兩漢辭賦世界中已屢見鋪陳，屈原〈離騷〉與宋玉的〈高唐〉、〈神女〉即為著名典範。亦可見辭賦與中國夢文學及其文化間的重要共同脈動。然則藉由辭賦書寫所欲透露或映射的魂夢內在蘊，即經常展現為一種焦慮的隱喻型態，因此或許藉助現代相關學說的參證，可以提供我們對於辭賦文本的另一觀照面向；另一方面透過陶、柳前後兩者之對讀，應有助於讀者巡禮傳統歸田辭賦書寫史上，不斷承傳演繹，並由「歸田」、「夢幻」、「焦慮」三者一體所構塑的辭賦論述主軸及其書寫底蘊。

二、歸返書寫的辭賦傳統與陶、柳姿態

無論陶淵明〈歸去來兮辭〉或柳宗元〈夢歸賦〉皆不約而同在創作主題上以歸返為訴求焦點。就陶、柳二人的基本撰寫背景而言，皆源於仕宦場域頓挫下的心路轉折，因此呈現於辭賦命題上的歸返姿態或者發為行動與語言

2 參見傅正谷，《中國夢文學史》（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3），頁89。又氏著，《中國夢文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頁447。

上的歸返姿態，是否就等同或意味心靈方向全然徹底的抉擇與執著；而這一問題就陶、柳二人本身及其作品而言，是否展現為前後呼應的相契一致，抑或彼此間互有出入。此其一；其次，就辭賦文學的歸返書寫淵源而言，早在屈原〈離騷〉早已樹立範式，並且就屈〈騷〉本身而言，更成為作者表述心路歷程的重要關鍵。因此從屈〈騷〉的歸返書寫而言，陶、柳二篇辭賦又復呈現何種創作意涵，亦值得加以探索。

（一）陶、柳詩賦合流的歸田書寫姿態

陶淵明以〈歸去來兮辭〉為代表的辭賦，成為傳統士人歸返田園的書寫典範，尤其是結合其他的田園詩作，使他成為繼承漢張衡〈歸田賦〉之後更具經典意義的田園文學代表作家，即在六朝鍾嶸詩學專論《詩品》中，亦因此稱許其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³可見陶淵明所代表的田園文學典範意義，是兼括辭賦與詩歌兩種文類的創作成果而言。

就辭賦歷史的歸田書寫而言，陶淵明〈歸去來兮辭〉雖然並非首倡，東漢知名賦家張衡〈歸田賦〉即已開啓此一寫作途徑，後世辭賦家的歸田書寫大體承繼遺緒，陶氏〈歸去來兮辭〉基本上即屬典型例證；然而就歸田主題的書寫型態而言，陶淵明則展現因革並作的特色。其中最具體的即以詩賦合流的跨文類創作姿態，再現東漢張衡歸田書寫的文學風華。

張衡為東漢後期的重要代表作家，五、七言體詩歌在當時並未如賦體般盛行於文士之間。從張衡本身傳世的詩文集來看，包括將殘篇一併檢視，則賦共計十三篇；詩則共計四篇，⁴包括〈四愁詩〉、〈同聲歌〉、〈怨篇〉與殘闕本〈歌〉。其中〈四愁詩〉一向被視為中國七言詩之祖，但實為楚騷體，故其詩之〈序〉謂：「時天下漸弊，鬱鬱不得志，為〈四愁詩〉。但屈原以美人為君子，……而懼讒邪，不得以通。」⁵可見與後世所言七言詩仍有所差異；至於〈同聲歌〉則為五言詩體，但亦具比興況味；〈怨篇〉、〈歌〉分別為四言、五言詩作。因此就今存張衡詩作而言，大體未見有與歸田書寫相關

3 參見梁·鍾嶸撰，汪中注，《詩品》卷中評「宋徵士陶潛詩」謂：「至如歡言酌春酒，日暮天無雲。風華清靡，豈直為田家語耶。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臺北：正中書局，1990），頁156。

4 參見張震澤校注，《張衡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頁1-271。

5 同上註，頁1。

內容。由此可見，張衡以〈歸田賦〉為代表的歸田之作，主要運用辭賦一體，並未出現詩賦合流的創作型態。

漢魏六朝的歸田書寫，以張衡〈歸田賦〉為首開書寫風氣之祖，其後亦不乏相關書寫的佳作，例如與張衡之賦同時選錄於《昭明文選》「志」類的潘岳〈閑居賦〉，雖未像張衡直接於賦題標榜「歸田」，但從其賦篇序文來看，其撰寫內容大體仍賡續張衡〈歸田賦〉之仕途告退，耕讀園田的重要旨趣，故潘岳〈閑居賦序〉謂：

方今俊乂在官，百工惟時，拙者可以絕意乎寵榮之事矣。太夫人在堂，有羸老之疾，尚何能違膝下色養，而屑屑從斗筲之役乎？於是覽止足之分，庶浮雲之志，築室種樹，逍遙自得。池沼足以漁釣，春稅足以代耕；灌園粥蔬，以供朝夕之膳，牧羊酤酪，以俟伏臘之費，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此亦拙者之為政也，乃作〈閑居賦〉，以歌事遂情焉。⁶

按《昭明文選》選錄的「志」類賦，包括張衡〈思玄〉、〈歸田〉二賦與潘岳〈閑居賦〉，這些賦篇雖命題取向各有偏重，然其旨趣所歸仍大體攸關「歸田」主題，〈歸田賦〉自不待贅言，潘氏〈閑居賦〉已說明如上，至於張衡〈思玄賦〉中雖不乏大量濃厚遠遊神似之書寫內容，然其旨歸則謂：「天不可階仙夫稀……結精遠遊使心攜。迴志竭來從玄謀，獲我所求夫何思。」而其具體情志則仍以「歸田」為核心：

文章曷以粲爛兮，美紛紜以從風。御六藝之珍駕兮，遊道德之平林。結典籍而為畧兮，毆儒墨以為禽。玩陰陽之變化兮，詠雅頌之徽音。嘉曾氏之歸耕兮，慕歷阪之嶽峯。恭夙夜之不貳兮，固終始之所服。夕惕若厲之省讐兮，懼余身之未勅。苟中情之端直兮，莫吾知而不惡。默無為以凝志兮，與仁義乎逍遙。不出戶而知天下兮，何必歷遠以劬勞。⁷

上述《昭明文選》「志」類賦的三篇作品，大體即以「歸田」之「志」為其具體的中心旨趣。由此可見，辭賦家的歸田主題書寫，早已其來有自，並大體以張衡、潘岳二人之賦為《選》家眼中的傳統典範。然則中國歸田主題書寫傳統的建立，乃與辭賦文學息息相關，《昭明文選》即為最有力的具體註

6 參見南朝梁·蕭統編，李善注，《昭明文選》（臺北：五南書局，1991），卷16，頁384-385。

7 參見張衡，〈思玄賦〉，《昭明文選》，卷15，頁380。

腳。

《昭明文選》既為漢代以下由辭賦開展的歸田主題書寫歷史，留下重要典範。同時，昭明太子蕭統又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的陶淵明編纂作品集，兩者相映成趣，似乎也不妨可以視為蕭統為歸田文學發展留下的重要具體見證。值得注意的是，若從歸田主題書寫的文類範疇而言，陶淵明的出現意義又成為歸田主題書寫由賦向詩拓展與轉換的重要關鍵。而從陶淵明開始，歸田書寫在詩歌世界的開展，相對於辭賦書寫而言益趨蓬勃，甚至於後世讀者已逐漸淡忘歸田主題書寫乃是源自辭賦，並由此向詩歌拓展的嬗變事實。

陶淵明雖非歸田書寫的首位作家，但其重要特色與意義乃在陶氏之前的歸田書寫，對於作者而言大體出於偶然感懷之作，然則對於陶氏而言，則轉變為個人創作世界的主體，甚且更是結合躬親的生活體驗。⁸因此與蕭統同時代的鍾嶸《詩品》中所稱陶氏乃「古今隱逸詩人之宗」，其中理由之一，主要針對陶氏大量別具個人特色的詩作而言。然則就歸田書寫而言，卻不可輕易忽略他另外撰寫的〈歸去來兮辭〉；換言之，陶淵明的〈歸去來兮辭〉與〈歸園田居五首〉等大量的歸田系列之作，不僅兼跨詩與賦兩大文類，甚且應適足具體而微映現出歸田文學書寫由賦到詩的歷史發展事實；其次，就陶氏本身而言，固然創作數量詩遠多於賦，但他以〈歸去來兮辭〉為主的歸田辭賦，卻應視為引領並奠定大量〈歸園田居〉等詩創作的重要基調，更何況就兩者的創作次序而言，〈歸園田居〉、〈歸鳥〉等相關詩作基本上皆為晉安帝義熙元年（405）之後所作；換言之，即大量的歸田詩作基本上應由他辭去彭澤縣令，撰寫〈歸去來兮辭〉後的陸續創作。⁹從而在陶淵明身上，展現歸田書寫詩賦合流的書寫特色。因此就上所述，歸田書寫由賦到詩的嬗變事實，以致詩賦合流現象，從蕭統主編的《昭明文選》到陶淵明集的文學客觀史實呈現，與陶淵明撰寫〈歸去來兮辭〉與〈歸園田居〉等實際情形來看，其實都隱約浮現出陶淵明在歸田主題書寫史的重要貢獻與特殊意義，其中又具體集中並展現在陶淵明詩賦合流的創作現象上。

8 參見王國瓊，《古今隱逸詩人之宗——陶淵明論析》（臺北：允晨文化公司，1999），頁75-108。

9 參見袁行霈，《陶淵明年譜匯考》，見氏著，《陶淵明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頁320-383。

陶淵明所屬的東晉時代，基本上還是一個詩與賦兩種文類並行的階段，當時文士亦普遍出現兼跨詩人與賦家兩種身分。這時的五言詩雖逐漸成爲文士創作的重要文體場域，以致梁代鍾嶸《詩品》乃稱許爲「眾作之有滋味者也。」¹⁰可見東晉以後五言詩的蔚然興起，已逐漸改變兩漢以辭賦爲宗的創作主流板塊，然而就整個魏晉南北朝而言，詩歌與辭賦固然已呈現彼消我長的創作生態變遷，然而這一階段大體還是以辭賦爲文學主流，也因此文壇普遍呈現「辭賦化」的特徵，¹¹而由梁代蕭統主編的《昭明文選》，在編纂次序上以賦爲首的特色，其實正不妨視爲當代這種文學生態的重要具體註腳。相對而言，陶淵明對於後代文學影響及其地位的躋升，到宋代方達到顛峰。然則唐代文士實已普遍重視其人品，¹²其中唐代詩人慕陶、效陶的不乏其人，例如中唐白居易、柳宗元等皆爲其中代表。然則從東晉南朝到中唐，陶淵明的影響固然日臻蔚興，但到柳宗元之時，雖然唐詩詩體的發展已大體完備，而詩歌創作的風氣相對於六朝而言，已呈現後來居上之勢。因此儘管辭賦仍然巧妙牽動著唐代文學的各種書寫樣態，¹³而且仍然延續著詩、賦合流的創作現象，但詩歌在唐代顯然已取代辭賦成爲文壇創作的主流。這一相異背景點對於陶淵明與柳宗元而言，實具有特殊的創得意涵。

柳宗元雖處詩歌盛行的中唐，但其文學成就卻又是多元的，除詩歌成就不凡外，又以名列唐宋古文八大家著稱，然則他在辭賦成就上其實亦不遑多讓於唐代其他賦家，表現極爲傑出，在唐賦發展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¹⁴他的詩歌雖非以田園之作爲主要大宗，但其中仍不乏慕陶與效陶之作，例如〈田家三首〉、〈飲酒〉、〈首春逢耕者〉、〈讀書〉等詩從詩題或內容上，都不難發現其中濃厚陶淵明的文學身影。這一類詩歌的近陶取向，早在宋、明以下詩話等詩文評論裡有所發明，例如曾季狸《艇齋詩話》、曾吉甫《筆墨閒

10 參見鍾嶸，《詩品》〈序〉。

11 參見王夢鷗，《古典文學探索》（臺北：正中書局，1984），頁118。

12 錢鍾書，《談藝錄》（臺北：書林，1989）「陶淵明詩題顯晦條」列舉豐富例證加以說明；另可參考鍾優民《陶學史話》（臺北：允晨，1991）及陳怡良《陶淵明之人品與詩品》（臺北：文津，1993）等書。此外如李劍峰〈論唐代人接受陶淵明的原因及條件〉，《文史哲》1999.3: 83-87，則亦試圖分析其中因素。

13 參見簡宗梧，《賦與駢文》（臺北：臺灣書店，1998），頁185-190。

14 參見馬積高，《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頁312-322。

錄》、孫明峰《評點柳柳州集》、蔣之翹《柳集輯注》等等。¹⁵ 柳宗元的這類田園詩明顯效法陶淵明〈歸園田居〉、〈歸去來兮辭〉的歸田書寫，其中自然不乏再現前代陶氏的心境與詩境；¹⁶ 至於在辭賦方面，柳宗元創作之質、量俱頗可觀，例如古賦九篇、騷體十篇。由此亦可略窺柳宗元在辭賦上的專意用心與勤於著述，這在唐代眾多的詩人群中並不多見，應可視為唐代詩、賦合流的重要代表作家。而在他的辭賦中自然也不乏抒發歸田情懷之作，這一部分主要映現於〈夢歸賦〉裡，至於其他辭賦如〈囚山賦〉、〈閔生賦〉等篇中亦不無流露思歸之情。但柳宗元〈夢歸賦〉對於歸田書寫的處理方式與表現手法，顯然與陶賦並非如出一轍，卻具有殊途同歸的特殊對讀意涵。這一點與陶淵明的歸田書寫，雖同樣呈現詩賦合流的創作型態，但就陶氏而言，〈歸去來兮辭〉與〈歸園田居〉等詩之間乃是同調之唱和；但就柳宗元而言，則〈田家三首〉等詩與〈夢歸賦〉之間，則呈現異曲同工之妙。換言之，陶、柳二人的歸田書寫，雖俱顯示出詩、賦合流的同質性，但在個別而具體的詩、賦作品處理上，顯然皆各臻巧妙，從而展現陶、柳詩賦合流，卻又各自別出心裁的對讀意蘊。然則其中的重要關鍵，又可從陶、柳兩人對於屈〈騷〉的不同接受角度上加以探析。

(二) 陶、柳對於屈〈騷〉的轉換與回歸

從屈〈騷〉首開辭賦文學的歸返書寫，就已深刻奠定與政治場域及其仕宦情懷不可切割的創作基調。例如〈離騷〉文本的重要轉折，即在於「吾將遠逝以自疏」的周遊天界書寫，到篇末翻然急轉所萌生的歸返意識。¹⁷ 因此儘管屈〈騷〉並未在創作主題上揚示出其中具有關鍵作用的歸返意識。然若從這一歸返的視域重新閱讀〈離騷〉，其實亦不妨視為屈原對於是否重新歸返原點的未來思考與生命定位，並且藉由文學話語所展開的辭賦論述。換言之，屈〈騷〉應可視為最早的一篇「歸去來兮辭」雛形。

15 參見王國安，《柳宗元詩箋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頁220、240、251。

16 參見葛曉音，《盛唐山水田園詩派研究》，頁338-348。

17 參見屈原等撰，宋洪興祖注，《楚辭補注》（臺北：長安出版社，1991），頁1-54。〈離騷〉末尾謂：「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陟陸皇之赫戲兮，忽凌睨乎舊鄉，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至於〈招魂〉中亦以「目極千里傷春心，魂兮歸來哀江南」作結，但一因涉及民俗儀式，二因所招對象，並無定論，姑且不論。

屈〈騷〉的歸返論述雖已為後世辭賦深具仕宦意涵的歸田書寫開拓蹊徑，但從他的後學宋玉及漢代以下的大量擬〈騷〉作品來看，似乎又主要衍生分化為兩大主題：「士不遇」與「歸田」。其中由宋玉〈九辯〉開始，到漢代司馬遷、董仲舒等人重複書寫的士不遇賦主題，乃至賈誼等人的弔屈原之作，無不主要聚焦於君臣遇合一事，並藉此重視屈〈騷〉的文學風華。當然這些弔屈原或標榜士不遇主題的辭賦，並非全不涉及歸返之情，但從其主題訴求到實際內容來看，歸返意識雖然逐漸受到忽略，難以與「士不遇」之旨相提並論，例如董仲舒〈士不遇賦〉篇末：「嗟天下之偕違兮，悵無與之偕反。孰若返身於素業兮，莫隨世而輪轉」¹⁸中述及的歸返意識，並未出現於賈誼〈弔屈原賦〉、司馬遷〈悲士不遇賦〉裡。然則從漢賦中大量士不遇書寫的情志出口，又大體導向神仙隱逸，或者即以玄遊為依歸，例如揚雄之〈太玄賦〉、班固〈幽通賦〉、〈終南山賦〉、馮衍〈顯志賦〉等等。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賦家馮衍結合神仙遊玄的賦篇中，同時已出現歸田之志，如〈顯志賦序〉即謂：

惟夫君子之仕，行其道也，慮時務者不能興其德，為身求者不能成其功，去而歸家，復羈旅於州郡，身愈據職，家彌窮困。……退而幽居，……年衰歲暮，悼無成功，將西田牧肥饒之野，殖生產，修孝道，營宗廟，廣祭祀。然後闔門講習道德，觀覽乎孔老之論，庶幾乎松喬之福。……疆理九野，經營五山，眇然有陵雲之意。乃作賦自厲，命其篇曰〈顯志〉。顯志者，言光明風化之情，昭章玄妙之思也。¹⁹

其中歸田之情雖非全篇旨趣所在，但已看到漢末張衡〈歸田賦〉中的基本輪廓，而馮衍今存〈楊節賦序〉佚文裡，亦出現類似歸田書寫，²⁰但似非全篇旨趣所在。然則由上述辭賦家對於屈〈騷〉的相關書寫，可見「歸返」意識並非漢代賦家創作的主要關注，至於由「歸返」轉變為「歸田」取向，則應是到馮衍、張衡的作品裡才逐漸醞釀發酵，終至成為重要書寫主題。

屈〈騷〉的「歸返」雖主要指涉著屈原仕宦的政治場域，然而卻由於屈

18 參見費振剛等輯校，《全漢賦》（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頁112。

19 參見馮衍，〈顯志賦〉，《全漢賦》，頁258-259。

20 〈楊節賦序〉：「馮子耕於驪山之阿，渭水之陰。廢弔問之禮，絕遊宦之路。眇然有超物之心，無偶俗之志。」同註18，頁265。

原本與楚國的特殊淵源，亦即楚國即是他實現仕宦報國的重要象徵；另一方面，屈原本亦屬楚宗室三姓景、屈、昭之一，楚王室與屈原之間兼具宗室之親，而他曾任三閭大夫，其中亦涉及這層因素。²¹ 因此屈〈騷〉篇末萌生的歸返意識，其實質上應可視為一種兼具「家」、「國」兩種情愫的情感召喚與精神掙扎。

屈〈騷〉篇末的歸返意涵，既籠括公義領域的淑世報國意涵，又同時富於私情意蘊的家園回歸。然則就「歸返」意識而言，公、私兩種性質的情志範疇，漢代辭賦家顯然淡忘或無心於屈〈騷〉的朝廷或社稷旨趣的書寫取向，轉而浸漸著墨於私情領域的追尋，其中固然衍生出馮衍到張衡的歸田主題創作，其餘則不乏神仙隱逸或遊心玄思的私情關注。其中張衡見錄於《文選》中的兩篇「志」類賦：〈玄思賦〉與〈歸田賦〉，正紹承屈〈騷〉歸返書寫遺緒的重要典範。但張衡二賦的分途書寫，與書寫主題的互有偏重，則更凸顯出〈歸田賦〉作為屈〈騷〉歸返家園的嬗變新向。如此發展，固非屈〈騷〉本意，然則謂其萌芽源自屈〈騷〉，應是符合辭賦發展的客觀歷史事實。

東漢末年張衡〈歸田賦〉具現傳統士不遇困境超越的論述型態。其中作為士人未來生涯的告白，到陶淵明大力耕耘的文學園地裡得到更集中的完整體現。但同時屈〈騷〉與張衡〈歸田賦〉、陶淵明〈歸去來兮辭〉的彼此分野也於此展露無遺。其中的主要關鍵在於歸返家園對於屈〈騷〉而言，同時也就是一種政治歸返意圖，公與私不同情志領域交疊合一；但在張衡或陶淵明辭賦的歸田書寫裡，則呈現為公、私分明的情志異趨，亦即對於張或陶二人而言，歸返田園是一種向以「家」為核心的私情領域的趨附，但同時對於以「國」為中心的政治場域，則意味著一種疏離或遠棄。此兩者對於張、陶二人而言，乃是魚與熊掌不可兼得。故陶氏〈歸去來兮辭〉是一篇遠離邦國到歸返家園意蘊的情志論述，這與屈原〈離騷〉所指涉的歸返家園與歸返邦國的雙重意涵，或許不致完全背離，但從士人情志領域公、私之間的終極取向而言，至少是一種轉換與新變。故〈歸去來兮辭並序〉乃謂：

余家貧，耕植不足自給；幼稚盈室，緜無儲粟，生生所資，未見其術。親故

21 參見金開誠，《屈原辭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頁38-52。

多勸余爲長吏，脫然有懷，求之靡途；會有四方之事，諸侯以惠愛爲德，家叔以余貧苦，遂見用於小邑。於時風波未平，心憚遠役；彭澤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爲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與之情。何則？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饑凍雖切，危已交病。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於是悵然慷慨，深媿平生之志。猶望一稔，當斂裳宵逝；尋程氏妹喪於武昌，情在駿奔，自免去職。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因事順心，命篇曰「歸去來兮」。²²

陶淵明的序文中始終關注著私情領域的家園及其親屬種種，相對而言，社稷邦國之事儼然並非陶氏關情所在。當然這也並不意味著對天下興亡、利己之事全然漠不關心。²³ 但就〈歸去來兮辭〉本身而言，顯而易見的是從序到本文始終充斥著濃厚的歸田意識與家園關懷，而他從此不再復出仕宦的事實，基本上清楚地映射出陶氏歸返田園的內在心迹及其生命歸宿的最後抉擇。

從屈〈騷〉以下辭賦的歸返書寫的嬗變發展來看，以陶淵明爲典範的歸田書寫，既是淵源於屈〈騷〉，卻又是某種程度上書寫方向的新變與轉換。到唐代之後，當詩歌創作已如火如荼開展的中唐階段，柳宗元仍然頗爲著意於辭賦寫作，他的田園詩作，固然不惜以擬作之姿力圖重現六朝陶淵明的歸田風範及其隱逸身影，而他以〈夢歸賦〉爲代表的歸返主題書寫，卻上溯屈〈騷〉，儼然是一篇對照張、陶二人辭賦歸田書寫下，重現屈〈騷〉書寫本色的復古論述。

柳宗元的效陶仿陶田園詩作，雖不乏濃厚的陶氏身影，然而終非陶氏化身的重要關鍵之一，²⁴ 乃在柳詩中揉合濃厚的屈〈騷〉色彩。²⁵ 故例如〈飲酒〉、〈讀書〉、〈首春逢耕者〉等近似陶氏風格之作中，時而難掩〈騷〉情，因此這類詩中雖具淵明風味，卻也經常形成一種遊移於屈〈騷〉與陶氏田園風情的書寫特色，例如：

22 參見楊勇校箋，《陶淵明集校箋》（臺北：正文書局，1987），頁266-267。

23 參見王國瓔，《古今隱逸詩人之宗——陶淵明論析》，頁267-296。

24 蔣之翹，《柳集輯注》謂：「子厚〈讀書〉、〈飲酒〉二首，不知如何費許多力氣摹仿，終是自做自家詩耳。」參見王國安箋注，《柳宗元詩箋釋》，頁256。

25 王國安，《柳宗元詩箋釋》，頁8。

南楚春候早，餘寒已滋榮，土膏釋原野，百蟄競所營。綴景未及郊，穡人先偶耕，園林幽鳥嘯，渚澤新泉清。農事誠素務，羈囚阻平生，故池想蕪沒，遺畝當榛荆。慕隱既有繫，圖功遂無成，聊從田父言，款曲陳此情，眷然撫耒耜，迴首煙雲橫。〈首春逢耕者〉

今旦少愉樂，起坐開清樽，舉觴酌先酒，爲我驅憂煩。須臾心自舒，頓覺天地喧，連山變幽晦，綠水函晏溫。藹藹南郭門，樹木一何繁，清陰可自庇，竟夕聞佳言。盡醉無復辭，偃臥有芳蓀，彼哉晉楚富，此道未必存。〈飲酒〉²⁶

其中〈飲酒〉本爲陶淵明的著名代表詩組，然而詩中如「頓覺天地喧」、「連山變幽晦」、「偃臥有芳蓀」、「此道未必存」等句中〈騷〉人不遇之情隱然可見，這些詩境與陶氏「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等悠然自得的田園意境迥然殊異。其中巧妙融合陶、屈於一爐的處理特色，應是重要原因之一。也因此陶淵明詩中歡欣自得的歸鳥特色，到柳宗元的詩歌中經常染就濃厚楚〈騷〉色彩。例如：

楚越有鳥甘且腴，嘲嘲自名爲鷓鴣，徇媒得食不復慮，機械潛發罹置罟。羽毛摧折觸籠藥，煙火煽赫驚庖廚，鼎前芍藥調五味，膳夫攘腕左右視。齊王不忍殺鯨牛，簡子亦放邯鄲鳩，二子得意猶念此，況我萬里爲孤囚。破籠展翅當遠去，同類相呼莫相顧。〈放鷓鴣詞〉

倦聞子規朝暮聲，不意忽有黃鸝鳴，一聲夢斷楚江曲，滿眼故園春意生。目極千里無山河，麥芒際天搖青波，王畿優本少賦役，務閑酒熟饒經過。此時晴煙最深處，舍南巷北遙相語，翻日迴度昆明飛，凌風斜看細柳翥。我今誤落千萬山，身同僇人思還，鄉禽何事亦來此，令我生心憶桑梓。閉聲迴翅歸務速，西林紫椹行當熟。〈聞黃鸝〉²⁷

這些詩歌中的歸鳥意象，與淵明「眾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等詩所展現的怡然忘憂形象顯然殊異。²⁸於是出現在柳詩中的歸鳥書寫具有明顯的困境意蘊，例如〈放鷓鴣詞〉篇末所謂「況我萬里

26 同上註，頁222-224、254-256。

27 同上註，頁246-249、249-251。

28 陶淵明，〈飲酒詩〉、〈讀山海經十三首〉，參見王叔岷箋證，《陶淵明詩箋證稿》（臺北：藝文印書館，1975），頁292、476。

爲孤囚」、「破籠展翅當遠去」，或〈聞黃驪〉之歸旨於「身同僇人不思還」、「鄉禽何事亦來此，令我生心憶桑梓」、「閉聲迴翅歸務速，西林紫樞行當熟」。由此亦可見柳詩筆下身陷困境意味的歸鳥意象，與陶氏詩文中的超越困境的取向，兩者的創作基調迥然殊異；換言之，柳詩中的田園與歸鳥書寫，固然近似陶氏之創作身影，然卻顯現屈〈騷〉貶逐不遇的重要意蘊。

柳宗元上述田園和歸鳥書寫，與陶淵明作品中類似的題材，卻往往最終呈現不同情志取向的重要關鍵，即在於屈〈騷〉在柳詩中的深刻牽動，並具體映現爲戀慕並思歸「家」、「國」的書寫旨趣，於是在陶氏〈歸去來兮辭〉中因極力揚棄與遠離的仕宦場域之下，純粹以私情爲導向的田園歸返，呈現爲一種「家」與「國」二者關係的割裂與疏離。這與在屈〈騷〉中「家」、「國」互成一體的建構，顯然背道而馳，而在柳宗元〈夢歸賦〉藉由歸田之抉擇，召喚家園，又同時魂繫君國的書寫中，其實不無借屍還魂之創作意味，並同時重現屈〈騷〉家、國合一的歸返論述建構。故〈夢歸賦〉謂：

指故都以委墜兮，瞰鄉閭之脩直。原田蕪穢兮，崢嶸榛棘。喬木摧解兮，垣廬不飾。……苟遠適之若茲兮，胡爲故國之爲慕。首丘之仁類兮，斯君子之所譽。鳥獸之鳴號兮，有動心而曲顧。膠余衷之莫能捨兮，雖判析而不悟。列茲夢以三復兮，極明昏而告愆。²⁹

柳宗元詩中田園歸返相關的有別於陶氏風情，由〈夢歸賦〉中關涉家園歸返卻大肆鋪陳故都想望，即源自於濃厚而深刻屈〈騷〉身影；當然對柳宗元而言，當他於貞元末年謫貶永州之前，其先祖早已宅居京城一帶，³⁰ 這一背景是其原因之一，然而柳氏視「家」、「國」一體，並且有君國取向的歸田書寫，顯然與他源自屈〈騷〉的啓示與牽動，具有密不可分的關聯，故他在〈弔屈原文〉裡即明顯地流露此種認同與契合：

29 參見楊家駱主編，《柳河東全集》（臺北：世界書局，1988），卷2，頁28。

30 參見柳宗元，《寄許京兆孟容書》云：「先墓所在城南，無異子弟爲主，獨託村鄰，自譴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者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已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尚在善和里舊宅，宅今已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腑。」同上註，卷30，頁321。

今夫世之議夫子兮，曰胡隱忍而懷斯。惟達人之卓軌兮，固僻陋之所疑。委故都以從利兮，吾知先生之不忍。立而視其覆墜兮，又非先生之所志。窮與達固不渝兮，……忠誠之既內激兮，抑銜忍而不長。芋爲屈之幾何兮，胡獨焚其中腸。吾哀今之爲仕兮，庸有慮時之否臧。食君之祿畏不厚兮，悼得位之不昌。退自服以默默兮，曰吾言之不行。既媮風之不可去兮，懷先生之可忘。³¹

其中柳宗元既視屈原之故都情結，爲「服道」、「守義」等等屬於達士大公大是之「忠誠」行爲；另一方面又深刻體察其「芋爲屈之幾何兮」宗教血緣的私情面向。由是亦可推知柳宗元心目中，屈原「家」、「國」一體的歸返底蘊。而且從此一角度而言，柳氏〈夢歸賦〉可謂與之不謀而合。而總結上述陶、柳二人辭賦中歸田書寫的形似而神非，正可由此略窺其機杼所在，從而說明兩者辭賦之歸返書寫對於屈〈騷〉分別映現出轉換與回歸的異趨特性。

三、樂園預擬與仕宦焦慮：陶淵明〈歸去來兮辭〉的 歸田藍圖及其相關作品之焦慮意蘊

從陶淵明〈歸去來兮辭〉與柳宗元〈夢歸賦〉的創作表層而言，儘管二者歸返的姿態不盡相同，然則從其深層的情志意蘊而言，其實都難以擺脫傳統士人往返於「家」、「國」世界裡的使命承擔及其理想實現的精神焦慮底蘊。尤其一旦面對仕途挫折、君臣不遇等種種違反當初預擬或憧憬的理想前景時，這一長期掩抑於心靈深層的精神焦慮，終將噴薄而出。於是浮現於士人文學創作的話語建構，固然可以謂之一種苦悶的象徵。但對於中國傳統士人而言，背負於道統與政統之間的任重道遠，似乎更宜視之爲焦慮的象徵。而這一中國傳統書寫特色，自可溯源屈〈騷〉所樹立的書寫典範。因此紹承屈〈騷〉歸返書寫遺緒的後世文士，如陶淵明與柳宗元二人，其實皆無從抉擇地置身於傳統辭賦裡藉由歸返書寫所隱喻的士人深層焦慮。然則當我們具體地將陶之〈歸去來兮辭〉與柳之〈夢歸賦〉彼此對讀，兩者作爲焦慮的文學隱喻固然一致，但陶、柳書寫實際所採取的歸返型態則不盡相同，而藉此所映射的焦慮意涵固亦有殊。

31 參見柳宗元，〈弔屈原文〉，同註29，卷19，頁226-227。

〈歸去來兮辭〉為陶淵明揮別仕宦舞台的情志告白，於他而言，踏上仕途的經歷固然不一而足，但似乎皆為期不長，而這回的彭澤縣令亦僅維持前後八十餘日，從此不再復出仕途。因此，就陶淵明本身而言，撰於此時的〈歸去來兮辭〉實具有重要意義，然而這篇作品固然是他仕宦生涯的告別宣言，但在他以歸返為書寫旨趣的文學話語裡，實涵蓋表象與深層的內外不同意蘊。也源於此一重要區別，〈歸去來兮辭〉中的歸返指涉，對於作者而言，固可視之為遊移於仕、隱之間的人生回首；然則從另一面向而言，其創作實質更無妨是一場生涯藍圖與樂園的重新預約。而且更形重要的是〈歸去來兮辭〉中藉由陶淵明生命歷程之今、昔，甚至於未來的彼此對照，並透過具體的歸返書寫為其時空置換的轉捩點下，閃現出樂園世界背後的焦慮本質。

〈歸去來兮辭〉的主要內容基本上是一篇歸田前景的樂園建構，因此我們容易從此賦的文字表層裡，閱讀到陶淵明為自己終究擺脫仕宦困境的生命重大抉擇，「因事順心」地以「歸去來兮」高歌生命中前所未見的一篇快樂頌。³² 然則陶淵明〈歸去來兮辭〉所營造的當下快樂樂章，實既構築於對過往困境之抽離或疏遠，也同時必須基於對於未來的殷切想望。誠如他在〈歸去來兮辭〉首段的開宗明義：

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³³

賦篇首段以下以歸田之樂為基調的快樂書寫，益形清晰。由次段開首的「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到篇末歸去於「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因此自始至終凸顯的欣喜愉悅的旨趣與情志取向，成為陶氏辭賦歸返書寫的中心主軸。然則潛藏於賦篇字裡行間的歸返論述，無可諱言地乃是形構在回首過往與追夢未來兩大話語板塊的擠壓互動，其關鍵在於當陶氏一再以「昨非」為基調，一路進行著仕宦之旅的否定與批判，並最終定位於「迷途」二字時，「奚惆悵而獨悲」遂為〈歸去來兮辭〉展開快樂論述的起始。而這一部分主要展現在〈歸去來兮辭並序〉裡。³⁴ 換言之，這段序文除可提供讀者理

32 陶潛，〈歸去來兮辭並序〉云：「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因事順心，命篇曰：『歸去來兮。』」《陶淵明集校箋》，卷5，頁267。

33 同上註，頁267。

34 同上註，頁266-267。

解陶氏〈歸去來兮辭〉的撰寫動機與背景外，另一方面也有助於洞察〈歸去來兮辭〉展開快樂論述的主要情志基礎。然則其中值得玩味的是，誤入仕途固非陶淵明「本我」的最愛，但對「自我」層次的一時論述而言，³⁵他卻又百般自責，然而就其「本我」而言，出仕恐亦非陶氏深惡痛絕之事，而他還在晚期作品中經常發出「無成之悲」的相關喟嘆。³⁶因此當他賦篇正文肅然以「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揭開全篇快樂歸返之旅的書寫序幕時，以往種種成爲陶淵明出仕的理由憑藉，甚或誘因動機，是否全數頓然消解無蹤？抑或在正文層層演繹與鋪陳的樂園話語中，被作者有意無意之間巧妙地掩飾或置換掉，以致於遺忘或忽略了〈歸去來兮辭〉摻雜著苦樂交陳，又復彼此牽動的錯綜底蘊？然則若從這一角度出發，重新檢視陶淵明斷續往返、長期掙扎到告別仕途，並撰寫〈歸去來兮辭〉作爲其心跡歷程的正式宣告，則這一篇由歸返爲題的辭賦，固不妨視爲陶淵明深具仕宦焦慮象徵的歸返書寫。

〈歸去來兮辭並序〉是陶淵明遠離並告別昨日仕宦生涯的具體論述，而賦篇正文則是他藉預擬未來圖景書寫歸返之樂的主要場域。從歸返主題而言，序言與正文兩者之間，既形成一種相互依存的緊密關係，又似乎呈現苦、樂二極化的各自表述及其疏離狀態。然而如此這般在〈歸去來兮辭〉錯綜書寫型態的競合組構裡，其實愈能凸顯並浮現出陶淵明潛隱此賦話語之下內在複雜而微妙的心靈世界。於是我們可以發現〈歸去來兮辭〉恐非是一種全然的快樂論述或單純的困境超越；換言之，〈歸去來兮辭〉中對於仕宦的遠離，或可視爲對於生命困境的暫時擺脫，生命方向的一場抉擇，但其中仍然苦樂交陳糾纏，沒有絕對的消解與超越。誠如上文所述，陶氏游移於仕、隱之間的徬徨掙扎與最終抉擇，其實都更深刻映現出對於仕宦一事的焦慮，如影隨形地沈潛於陶淵明的精神世界底層，並視客觀因素的牽動召喚，若隱若現，甚至水落石出。也因此陶氏於〈歸去來兮辭〉之後，仍然撰寫〈感士不遇賦〉作爲其重要而具體的仕宦論述，³⁷其旨趣大體發明於序文：

35 參見佛洛伊德 (Sigmund Freud) 著，吳康譯，《精神分析引論新講》，〈心理人格的解剖〉（臺北：桂冠圖書公司，1998），頁 68-74。

36 參見王國瓔，〈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聘——陶詩中的無成之悲〉，《古今隱逸詩人之宗——陶淵明論析》，頁 135-166。

37 〈感士不遇賦〉撰於〈歸去來兮辭〉之後。袁行霈，《陶淵明年譜會考》曰：〈歸去來兮辭〉

昔董仲舒作〈士不遇賦〉，司馬子長又爲之；余嘗以三餘之日，講習之暇，讀其文，慨然惆悵。夫履信思順，生人之善行；抱朴守靜，君子之篤素。自眞風告逝，大偽斯興，閭閻懈廉退之節，市朝驅易進之心。懷正志道之士，或潛玉於當年；潔已清操之人，或沒世以徒勤。故夷、皓有「安歸」之歎，三閭發「已矣」之哀。悲夫！寓形百年，而瞬息已盡；立行之難，而一城莫賞；此古人所以染翰慷慨，屢伸而不能已者也。夫導達意氣，其惟文乎！撫卷躊躇，遂感而賦之。³⁸

由此觀之，陶淵明〈歸去來兮辭〉中毅然告別的仕宦之旅，雖藉由「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而視爲「不諫」之「已往」與「昨非」之「迷途」，並企圖以「舟遙遙而輕颺，風飄飄而吹衣」的瀟灑出塵之姿，揚棄仕宦之想，然則從其稍遲撰述的〈感士不遇賦〉及相關詩作的慨然有思，顯然映現出〈歸去來兮辭〉裡看似全盤否定的仕宦措辭，只能視爲陶淵明仕宦觀照的某一側面，究非全貌。而在〈感士不遇賦〉裡，陶淵明雖亦不乏近似〈歸去來兮辭〉的欣然歸返表述，例如：

寧固窮以濟意，不委曲而累己；既軒冕之非榮，豈緼袍之爲恥。誠謬會以取拙，且欣然而歸止。擁孤襟以畢歲，謝良價於朝市。³⁹

然而另一方面復藉大量古今賢士不遇的例證，撫昔傷今，寄慨於「感哲人之無偶，淚淋漓以灑袂」、「伊古人之慷慨，病奇名之不立」、「坦至公而無猜，卒蒙恥而受謗」、「雖懷瓊而握蘭，徒芳潔而誰亮」、「庶進德以及時，時既至而不惠」等等悲切感懷。由此可見陶氏對於仕宦的苦、樂並陳，及其掙扎、抉擇，與以歸田之樂爲題的〈歸去來兮辭〉，兩者論述雖各闢蹊徑，卻應屬異構同質的仕宦論述，而仕宦對於陶淵明而言，具有不可取代的永恆意義，但對現實世界而言，終其一生，仍是一個永遠無法完全逃避或擺脫的精神焦慮。其一生承受負荷的內在壓力，⁴⁰ 巧妙而生動地藉由以歸返爲旨趣的

撰於東晉義熙元年，〈感士不遇賦〉則撰於東晉義熙三年。參見氏撰，《陶淵明研究》，頁320-383。

38 參見陶淵明，〈感士不遇賦〉，《陶淵明傳校箋》，卷5，頁255。

39 參見陶淵明，〈感士不遇賦〉，《陶淵明傳校箋》，卷5，頁256-257。

40 參見（美）卡倫·霍爾奈（Karen Horney）著，雷春林、潘峰譯，《精神分析新法》，〈焦慮〉（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9），頁127-136。書中作者還提出對於當事人所追求之對象或價值，並常寄託安全感於其中，而當這些事物受到破壞、威脅或壓抑，將可能引發

辭賦書寫裡，化身為陶淵明一生仕宦焦慮的文學隱喻或論述象徵，從而構成作者表述內在精神壓力，並映射於外的焦慮特徵。而且就仕宦價值之追求而言，歸返正是一種對「應該審視的重要價值之威脅作出的反應」，⁴¹而陶淵明以〈歸去來兮辭〉代表的歸田書寫，應可視為它藉由辭賦話語傳達精神反應的主要具體象徵。此外，一面肯定仕宦的意義與價值，卻又同時出現批評、否定的言論，這既具依存性，又兼有反叛色彩的雙重存在，其實也正映射出交織於〈歸去來兮辭〉、〈感士不遇賦〉中的仕宦基本焦慮。⁴²

從〈感士不遇賦〉中始終殷殷致慨於士不遇之旨而言，仕宦之意義對於陶淵明而言，誠然是紹承聖賢，大濟蒼生，並立名垂世，具有濃厚的儒家理想取向；同時就務實的生活層面而言，出仕亦可迎刃而解地改善「家貧，耕植不足自給」的困窘現狀，然而從儒家價值而言，這一原屬經濟層面的問題，對於陶淵明而言，終究密切關涉於儒士立身之道，所謂：「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⁴³而他在〈詠貧士〉等詩作裡也一再宣示安貧樂道之志。⁴⁴可見出仕對於陶氏原有的家貧之歎，仍然深刻賦予儒家仕宦理想的重要精神。而他在〈歸去來兮辭並序〉所揭櫫的辭官歸田理由，其實不離一個最核心的價值指涉，此即儒家仕宦之道。例如所謂「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並非指其率性而為，而應是根據本身於君子之德的認知，對當代仕宦惡劣環境的回應；換言之，這種「任真」的修誠之信，才是陶氏所謂「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的主要意涵，而他在〈感士不遇賦並序〉的表述，應可作為具體註腳：

夫履信思順，生人之善行；抱朴守靜，君子之篤素。自真風告逝，大偽斯興，閭閻懈廉退之節，市朝驅易進之心。懷正志道之士，或潛玉於當年；潔已清操之人，或沒世以徒勤。故夷、皓有「安歸」之歎，三閭發「已矣」之哀。⁴⁵

焦慮反應。

41 同上註，頁127-136。

42 同上註，頁134。

43 參見《論語》〈衛靈公〉與〈述而〉，潘重規注，《論語今注》（臺北：里仁書局，2000），頁331、137。

44 參見王國瓊，〈陶淵明的儒家情節〉，《古今隱逸詩人之宗——陶淵明論析》，頁290。

45 參見陶潛，〈感士不遇賦並序〉，《陶淵明傳校箋》，卷5，頁255。

然則陶氏序文所謂「飢凍雖切，違己交病」，本質上仍基於當經濟層面問題觸及仕宦之道的文化準則時，兩者之間的拉扯掙扎，既主要圍繞仕宦一事，於是對於身處其位的陶淵明而言，「飢凍」之悲與「違己」之苦，交相擦撞的結果，仕宦焦慮隨之成形。

嘆貧與違己兩者間的不可調諧，實從陶淵明開始踏上仕宦之路，便已是無可避免的焦慮之源，而他幾番出入仕途，時或源於「口腹自役」，時或因「違己交病」，可見仕宦一事對於陶氏而言，乃呈現為一種看似相安無事，卻又隱含緊張的擺盪關係，這一特質其實正頗符合焦慮的重要特質。⁴⁶誠如他在〈歸去來兮辭並序〉所說「嘗從人事」的仕宦之旅，雖可改善「家貧」，但這一源於「口腹自役」的仕宦舉動，卻又在面對「平生之志」時，衍生出「悵然慷慨」與「深媿」等忐忑不安的精神壓力，並在自我形構的內在威脅裡長期壓抑，甚至產生徬徨無助之感，而仕宦焦慮於焉誕生。⁴⁷

〈歸去來兮辭〉序文的表述裡，其實深刻地映現陶淵明幾度出入仕宦之路所隱含的仕宦焦慮。然而當陶淵明經過內心長期的自我煎熬與壓抑無助，終於痛下抉擇，以壯士斷腕之姿，辭退彭澤縣令，從此絕意仕途，並以〈歸去來兮辭〉作為確定其生涯轉向的正式宣言，甚至在此一再大肆鋪陳歸田之樂，作為自我預約未來生命藍圖時，原先浮現於〈歸去來兮辭並序〉裡的仕宦焦慮是否從此與陶淵明飄然揮別？抑或在樂園虛擬與前景預約的瑰麗煙霧中，雖然暫時模糊，然則過往仕宦處境之內在焦慮，卻又不自覺地陷入於另一場才始積漸寢微的精神風景？其中看似不同的是從仕宦舞臺置換為田園場域，然則仕宦焦慮的本質並未隨之消失。

〈歸去來兮辭〉正文的書寫取向，顯然與序文大異其趣。序文中充塞愁苦焦慮的仕宦論述及肅穆沈鬱的作者形象，倏地轉換為「載欣載奔」、「園日涉以成趣」、「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等輕快曼妙的田園樂章及怡然自得的士人身影。然則這一田園之樂的生活藍圖，畢竟出自陶氏內在心靈的主

46 同註 40，頁 134。

47 按照（美）卡倫·霍爾奈，《精神分析新法》所述，焦慮本質上常具備對威脅之源的內在壓抑，並常陷入孤立無助、兩難處境，甚至常隱含一種內疚之感。而此一基本焦慮，常對環境感到驚懼不安，並易感受他的個性被抹煞，自由被剝奪、幸福被禁止的危險。同註 40，頁 42-44。

觀預約與樂觀擬構，同時歸田樂園本身就作者書寫策略而言，又是巧妙地藉由「鋪采摛文」的辭賦文類特性，⁴⁸及其書寫手法，讓陶氏原本簡樸無奇的歸田生涯，煥發為色彩繽紛，欣欣向榮。換言之，經由陶淵明筆下巧妙生動之辭賦寫作能事，於是詩情畫意的田園生活百姿一一被鋪陳造設，如夢似幻地令人憧憬。然則〈歸去來兮辭〉正文中的樂園預擬，固不能視為陶氏自欺欺人的美麗謊言，但質實而言，歸田生活並未如賦篇正文所述那樣無憂無慮，閒適自得。換言之，經由辭賦鋪陳的歸田生活，雖非全出於作者杜撰，有其實際的田園經驗，但其中顯然出自作者的主觀預擬與樂觀想望。其中明顯揉合辭賦工於妝飾的美化效果；而且這一得力辭賦濡染的田園圖景，更重要的意義還在於深刻地凸顯陶淵明終於告別仕宦之苦的當下心境，於是經由鋪陳美化的歸田書寫，相對地愈能展現他長期心靈折磨終獲擺脫的一時之快。因此，當時出仕的具體根由，如「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餅無儲粟」、「公田之利，是以爲酒」等等，似乎頓時從陶氏世界裡蒸發無蹤，不再成爲疑慮，然而從實際的田園生活而論，陶氏並未能根本解決這些當初數度出仕的基本生活問題，更何況仕宦一事之於儒家情結深厚的陶淵明始終具有嚴肅的生命意義。然則陶氏的仕宦焦慮容或一時潛隱，視而不見，根本上卻難以永遠從其精神世界銷聲匿跡。

〈歸去來兮辭〉正文內容的田園圖景，或許只該視為作者主觀意願及自我預擬的參考藍圖，卻無法成爲具體實踐的真正生活全部。而賦篇中令人欣賞的快樂論述，對照於陶氏歸返田園以後的生活感受，則益形凸顯〈歸去來兮辭〉中歸田生活之樂的片面性與侷限性，與其異於現實的夢幻質素，從而成爲歸田心境的當下投影。例如陶詩中〈歸園田居五首〉、〈飲酒二十首〉……等等，詩中即不乏田園苦與貧之喟嘆：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歸園田居五首〉
 雖有荷鋤倦，濁酒聊自適。〈歸園田居五首〉
 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歸園田居五首〉
 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獲早稻一首〉
 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干。〈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獲早稻一首〉
 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長飢。〈有會而作〉

48 參見劉勰，《文心雕龍》，〈詮賦〉（臺北：金楓出版社，1987），頁91。

貧居乏人工，灌木荒余宅。〈飲酒二十首〉
 量力守故轍，豈不寒與飢。〈詠貧士七首〉
 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乞食〉⁴⁹

由上所列陶氏對於田園生活貧苦的詠歎，得以洞鑒他撰於絕宦歸田之際的〈歸去來兮辭〉，實不乏預擬的夢幻色彩。同時，這一經由辭賦筆法妝扮潤飾的田園想望，一方面既是陶淵明以預擬未來寓託仕宦焦慮的文學隱喻，亦復成爲他力圖紓解焦慮的具體途徑與出口，誠如他在〈感士不遇賦並序〉所說：「此古人所以染翰慷慨，屢伸而不能已者也。夫導達意氣，其惟文乎」。然則〈歸去來兮辭〉如夢似幻的田園生活藍圖，其實正如一面心靈的鏡子般，藉由虛幻樂園圖景的巧妙營構，清晰映射出陶淵明現實生活中長期積漸成形的仕宦焦慮，而其夢幻特質的表述型態，亦從而顯露出作者內在精神世界的焦慮取向。⁵⁰ 換言之，從陶淵明〈歸去來兮辭〉序文及其經歷歸田實際的相關表述來看，〈歸去來兮辭〉本文中恍似真實的歸田生活預擬，本質上亦不乏一種夢幻質素，於是田園夢想世界成爲陶淵明仕宦焦慮的另一種隱喻或象徵。甚且此一仕宦焦慮的兩大根源，即改善「家貧」與「大濟蒼生」的出仕動機，其實在他歸田之後，無一獲得實現，依舊出現重陷於〈歸去來兮辭並序〉所謂「飢凍」與「違己」二者「交病」的困境。由此反觀〈歸去來兮辭〉正文的樂園虛擬，陶淵明企圖以歸田樂園，將「飢凍」與「違己」二者「交病」之內在威脅，畢其功於一役。客觀而論，不無落入癡人說夢窠臼之虞。即如前文所述，晚期的陶淵明既無力改善「家貧」，甚至每況愈下；另一方面歸田之後，又陸續撰寫〈感士不遇賦〉，甚至終老之前，仍不時於詩文中流露仕宦無成之悲。⁵¹ 可見歸返田園，只是將陶淵明生命中的仕宦焦慮，從仕途處境置換爲田園場域，其間似乎擺脫了仕途與市朝趨僞喪真的痛苦煎熬，然而當他正式歸返田園之後，既更見歎貧之悲，並且終其一生，以士不遇爲其生命巨憾，則豈不亦爲另一種「違己交病」與「深媿平生之志」。由是而觀，仕宦的焦慮顯然並未在陶淵明辭仕歸田後，隨之告退消解；反之，適

49 以上諸詩分別參見晉·陶潛撰，王叔岷箋證，《陶淵明詩箋證稿》，頁110、118、109、266、366、320、437、134。

50 參見(美)卡倫·霍爾奈，《精神分析新法》，〈焦慮〉，頁134。

51 參見王國瓊，《古今隱逸詩人之宗——陶淵明論析》，頁135。

成爲陶淵明田園文學世界裡另一創作底蘊。然則大肆鋪陳於〈歸去來兮辭〉正文的歸田樂景，即以預擬未來作爲映襯陶淵明一生仕宦焦慮的重要隱喻。

四、歸夢鋪陳與貶謫焦慮：柳宗元〈夢歸賦〉的 夢境書寫及其相關作品之焦慮取向

從上述陶淵明〈歸去來兮辭〉序文與正文的對讀中，大體可以觀察他經由「已往令不諫」與「來者之可追」的賦篇結構中所映射而出的仕宦焦慮。換言之，陶氏藉由這般的論述設計，展開歸田世界裡聯翩浮想的樂園圖景，然則從他刻意經營與鋪染的歸田裡，卻可以洞察作者閃躲於樂園預擬背後的仕宦焦慮面向。因此從另一角度而言，以富於夢幻意味的樂園預擬爲具體書寫主軸的〈歸去來兮辭〉，適又成爲陶淵明仕宦焦慮世界的重要隱喻，其間深具夢幻色彩之樂園預擬成爲陶氏流露內在焦慮的重要暗示與主要載體。⁵²由此而觀，唐代慕陶的另一位山水田園代表作家柳宗元的〈夢歸賦〉，即直接以「歸返」與「夢幻」作爲其書寫主軸與命題旨趣。然則針對陶、柳二人辭賦前後相關的書寫現象，加以對照探索，應可有助於審視辭賦史上歸返書寫現象中，前後相承的發展脈絡及其內在規律的一個面向。

〈夢歸賦〉撰於柳宗元因王叔文案坐貶永州之時。⁵³而柳宗元自於永貞末（805）貶爲永州司馬，體羸多疾，又遭母喪，因此詩文中每見自悼之情，同時亦復殷切早日重返長安，然於遲無消息之下撰於元和六年（811）的〈懲咎賦〉即已明顯流露「不得內召」之想。⁵⁴然則「不得內召」儼然成爲柳氏永州貶謫的主要夢魘，而且這一夢魘盤據在他的心靈深處至少長達十年左右，⁵⁵而且早在元和三年撰成的〈懲咎賦〉中即已流露這一由永州貶謫，又不得內召重返長安，所招致精神的驚懼、徬徨、不安與無助，乃至深自壓

52 夢幻常爲洩露焦慮傾向的重要途徑，據（美）卡倫·霍爾奈所論。同註40，頁134。

53 參見楊宗駱主編，《柳河東全集》，卷2，頁27。

54 見歐陽修等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168〈柳宗元本傳〉云：「宗元不得內召，悶悼悔念往咎，作賦自懲，曰懲咎。」頁5140。

55 按柳宗元於元和十年（815）方詔還長安。然正月啓程，二月抵京，三月旋即出任柳州刺史。參見羅聯添，《柳宗元事蹟繫年暨資料類編》（臺北：國立編譯館，1981）頁149-151。

抑，並從而衍生的貶謫焦慮。⁵⁶誠如賦中所述：

皇鑑之明宥兮，繫郡印而南適。惟罪大而寵厚兮，宜夫重仍乎禍謫。既明懼乎天討兮，又幽慄乎鬼責。惶惶乎夜寤而晝駭兮，類磨礱之不息。……哀吾生之孔艱兮，循凱風之悲詩。罪通天而降酷兮，不殛死而生爲。逾再歲之寒暑兮，猶質質而自持。將沈淵而殞命兮，詎蔽罪以塞禍。惟減身而無後兮，顧前志猶未可。進路呀以劃絕兮，退伏匿又不果。爲孤囚以終世兮，長拘孿而輓軻。⁵⁷

其中不得內召歸返長安，顯然成爲柳宗元貶謫焦慮的主要根源之一，然則不得歸返長安，對他而言，一方面既涵蓋仕宦焦慮的基本意涵，同時也就是被迫與私情領域意涵之家園世界相互隔離，誠如他在〈寄許京兆孟容書〉所述緬懷祖先陵墓與田園荒蕪的雙重愧疚自責。⁵⁸由此對照於前文所論陶淵明〈歸去來兮辭〉裡，仕途與家園兩者背馳對立的關係，柳宗元的歸返，既是滌清罪人身分，重返仕途之路，同時也別具家園回歸意涵，其中仕途與家園並行不悖，相輔相成。因此歸返書寫在陶、柳二人辭賦裡，基本上固然皆攸關仕宦之焦慮，但兩者之間實際的焦慮取向與表述型態顯然同中有異，因此從柳宗元作品中所映射的具體焦慮而言，其實更適於以貶謫焦慮視之。

柳宗元辭賦裡所揭示的貶謫焦慮，經常外現爲一種淪陷型態，⁵⁹而此一傾向正映現在柳宗元筆下的囚徒自喻，這一企圖藉由歸返逃脫樊籠的精神取向，亦曾出現在陶淵明的仕宦焦慮裡面，如他在〈歸園田居〉中所示「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久在樊籠裡，復得返自然」，⁶⁰於是在〈歸去來兮辭〉中，作者極思尋求解脫的「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情境，適可視爲陶淵明焦慮掙脫的具體註腳，然則對他而言，最終的抉擇固然使他擺脫宦場所帶來精神樊籠的禁錮，但卻難以逃脫出

56 對於具有帶來危險、威脅之事物，引發恐懼、孤立無助、不安的內在壓抑與緊張狀態，即爲焦慮的重要本質。參見佛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論新講》〈焦慮與本能生命〉，頁79-110，另可參見（美）卡倫·霍爾奈，《精神分析新法》，〈焦慮〉，頁127-136。

57 參見柳宗元，〈懲咎賦〉，《柳河東全集》，卷2，頁25。

58 參見柳宗元，〈寄許京兆孟容書〉，《柳河東全集》，卷30，頁321。

59 據現代精神分析理論，焦慮常呈現爲精神上的一種淪陷狀態，及孤立無助之威脅。同註40，頁42-44。

60 參見陶潛，〈歸園田居五首·其一〉，王叔岷，《陶淵明詩箋證稿》，頁103-105。

仕宦在陶淵明生命底層裡，由儒家情結及其價值意識所建構的精神天地。因而就陶淵明而言，這一「宦場樊籠」所隱喻的困境，雖經由歸返田園的生命轉向，暫告舒緩，然則源自於儒家仕宦的焦慮，終究並未隨著他遠離仕途到歸返田園的轉換裡，徹底消解。換言之，如果說陶淵明「久在樊籠裡，復得返自然」的官場禁錮指涉，固然在〈歸去來兮辭〉中展現為生命的自我抉擇，並在歸返田園的書寫裡，欣然自得，但其實卻又同時在由誤落到歸返的姿態轉換裡，不自覺地復陷入生命價值中根深蒂固的仕宦樊籠，從而映射為田園歸返書寫裡，隱微卻又頗堪思索的仕宦焦慮；相對於陶氏經由自我抉擇的型態而言，柳宗元源自長安貶謫的樊籠桎梏，卻呈現為身不由己，孤立無助的拘囚身影，因而始見於〈懲咎賦〉中「進路呀以劃絕兮，退伏匿而不果。為孤囚以終世兮，長居攣而轉軻」。這一深具自我淪陷之感的拘囚意識，對於謫貶永州的柳宗元似乎已是一場深烙底層不可揮離的精神夢魘，於是我們可以在以歸夢為隱喻，並以謫囚象徵靈魂禁錮的〈夢歸賦〉裡，洞鑒柳宗元辭賦裡圍繞謫囚中心所展延的一場焦慮論述。

〈夢歸賦〉開宗明義的「權擯斥以窘束兮，余惟夢之為歸」，不僅是全篇的論述基調與主要脈絡，實際上亦為作者此賦謫囚焦慮論述作了具體見證。首先，夢幻是流露內在焦慮的重要基本途徑之一，⁶¹則直接以具體的夜夢型態，揭示其內在謫囚焦慮。夢大體可以視為觀察人類精神領域潛意識活動的具體重要途徑，⁶²而〈夢歸賦〉的夢境鋪陳主要映襯為以長安及其家園歸返為主的內容。而其寓託於夢魂型態的歸返書寫，基本上即應視為與現實中永州謫囚身分的自我內在對話。而長期身陷謫囚的禁錮處境所賦予他的精神夢魘，更清楚的具現於他撰於謫貶永州第十年的〈囚山賦〉裡：

胡井智以管視兮，窮坎險其焉逃。顧幽昧之罪加兮，雖聖猶病夫嗷嗷。匪兇吾為桎兮，匪豕吾為牢。積十年莫吾省者兮，增蔽吾以蓬蒿。聖日以理兮，賢日以進。誰使吾山之囚吾兮滔滔。⁶³

61 (美)卡倫·霍爾奈(Karen Horney)謂：「每一種焦慮，無論潛在的還是明顯的，卻可能因種種原因受到壓抑，焦慮也許只有在夢境中，在身體上的伴隨症狀裡，在通常的草率中才顯露出來，無須被有意識的察覺。」參見《精神分析新法》，頁134。

62 參見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撰，呂俊、高伸春、侯向群譯，《夢的解析》(臺北：米娜貝爾出版公司，2000)，頁34-61。

63 參見元和九年柳宗元撰，〈囚山賦〉，《柳河東全集》，卷2，頁29。

由此可見自我的謫囚觀照確是柳宗元永州十年久居，不得歸返的重大創痛象徵。若據此對照於〈夢歸賦〉，藉由夢返長安的困境隱喻，兩賦之間適以虛、實互補的書寫對比，清楚地勾勒出柳宗元拘困永州的謫囚焦慮。

從柳宗元謫囚自視的精神困境隱喻而論，〈夢歸賦〉的歸田書寫應可視為他消解謫囚焦慮的精神出口，賦篇所謂「指故都以委墜兮，瞰鄉閭之脩直」，即是他力圖置換當下困境的精神象徵，而所運用魂夢形式也理所當然地成為此一謫囚焦慮的重要具體隱喻。其中既巧妙鑄鑄作者屈〈騷〉閱讀經驗裡的書面材料，又復芟刪屈〈騷〉原有濃厚的神秘巫術色彩，代之以生活常態裡的夜夢型態。然而藉由魂夢的歸田書寫，固然一方面可視為謫囚焦慮的精神隱喻，但從另一角度這一焦慮的精神可能出口，實際上似乎不能有效地紓解柳宗元的原有焦慮。即使在夢境本身，也展現出與陶淵明〈歸去來兮辭〉不同的情境取向。

陶淵明〈歸去來兮辭〉裡的夢幻特質，基本上表現為一種願望性滿足功能的傾向，⁶⁴於是洋溢於賦篇裡的田園快樂論述，尤其是字裡行間相關話語的此起彼落，例如「舟遙遙以輕颺」、「載欣載奔」、「童僕歡迎」、「眄庭柯以怡顏」、「園日涉以成趣」、「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木欣欣以向榮」、「善萬物以得時」、「樂夫天命復奚疑」等等，乃一一成為映襯此類願望滿足特質的具體夢境見證。相對而言，柳宗元〈夢歸賦〉則在迷離恍惚的夢境鋪陳裡，呈現為順逆交錯的不安狀態，例如賦中描述歸夢歷程的其中一段：

浮雲縱以直度兮，云濟余乎西北。風纚纚以輕耳兮，類行舟迅而不息。洞然於以瀟漫兮，虹蜺羅列而傾側。橫衝颿以盪擊兮，忽中斷而迷惑。靈幽漠以滯汨兮，進悵悵而不得。白日邈其中出兮，陰霾披離以泮釋。施岳瀆以定位兮，互參差之白黑。忽崩騫上下兮，聊按行而自抑。

尤其賦中書寫長安家園的荒蕪不堪，例如「園田蕪歲兮，崢嶸榛棘。喬木催解兮，垣廬不飾」，與陶淵明〈歸去來兮辭〉的田園恬憩迥然異趣。例如柳賦中夢返家園的悲鬱書寫：「魂恍惘若有亡兮，涕汪洋以隕軾。類曠黃之黥漠

64 依據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說法，夢大體可分為願望夢（wishful dreams）、焦慮夢（anxiety dreams）、懲罰夢（punishment dreams）三類。參見《精神分析引論新講》，頁20-23。「願望夢」的願望滿足功能，可參見佛洛伊德，《夢的解析》，頁599-618。

兮，欲周流而無所極。紛若喜而怡儼兮，心回互以壅塞」，即流露出焦慮不安的夢境取向。並且這一內在焦慮，甚至還具現為作者驚夢初醒的難安與歸返不再之餘悸：

鐘鼓喧以戒旦兮，陶去幽而開寤。罽罽蒙其復體兮，孰云桎梏之不固。精誠之不可再兮，余無蹈夫歸路。⁶⁵

由是而觀柳宗元〈夢歸賦〉之夢境取向，明顯別於陶淵明歸田書寫的「願望夢」取向，而反較近似現在精神分析所謂的「焦慮夢」取向；⁶⁶ 換言之，陶淵明的焦慮原點並不在歸田書寫本身，故〈歸去來兮辭〉才得以追夢的姿態，預擬歸田樂園；然則柳宗元的謫囚焦慮，雖亦關涉仕宦焦慮一事，然其具體核心，實主要集中於謫囚永州與夢返長安之間所形構的精神樊籠及其內在焦慮。因此，柳宗元的夢境歸返基本上並不盡然能有效地成為實現困境及其掙脫願望的滿足或補償；反之，適成為投射謫囚焦慮的另類場域。而這般不分晝夜的精神壓抑與內心煎熬，加上柳宗元南謫永州的水土不服與體羸疾纏，其間又遭逢母喪，因此身心交攻之下，柳宗元筆下的夢幻世界，相對於陶淵明〈歸去來兮辭〉的樂園論述，徒然呈現為悲觀而難以實現的焦慮夢境，他另一篇同作於永州的〈閔生賦〉即流露出這般的生命憂思與自憐自艾：

閔吾生之險阨兮，紛喪志以逢尤。氣沈鬱以杳眇兮，涕浪浪而常流。膏液竭而枯居兮，魄離散而遠遊。言不信而莫余白兮，雖遑遑欲焉求。合喙而隱志兮，幽默以待盡。……登高岳而企踵兮，瞻故邦之殷麟。山水浩以蔽虧兮，路翁勃以揚氛，空廬頽而不理兮，翳丘木之榛榛。塊窮老以淪放兮，匪魍魎吾誰鄰。……余囚楚越之交極兮，邈離絕乎中原。壤汗潦以墳沔兮，蒸沸熱而恆昏。……仰矜危而俯慄兮，弭日夜以拳攀。慮吾生之莫保兮，忝代德之元醇。⁶⁷

賦中申明己身久謫不歸之無可奈何與沈冤難辯，與〈夢歸賦〉所運用之夢幻書寫，手法雖殊，但旨趣契合，兩者相輔相成。然則其中之「沈抑不舒」與

65 參見柳宗元，〈夢歸賦〉，《柳河東全集》，卷2，頁28。

66 「焦慮夢」常呈現為夢境世界的焦慮不安及其夢中驚醒傾向，而夢本身實具有反映焦慮的重要意義。參見佛洛伊德，《夢的解析》，頁619-631。

67 參見柳宗元，〈閔生賦〉，《柳河東全集》，卷2，頁26-27。

「但有自慙」，⁶⁸亦適為〈夢歸賦〉焦慮夢境的具體註腳。然則對於執守儒家「大中」之道，並以「患者」自視的柳宗元而言，⁶⁹〈夢歸賦〉不無癡人說夢之嫌，歸返之夢對於當時的他而言，不僅徒為一場遙遠的夢，甚至還是一種內在壓抑意蘊濃厚的焦慮象徵，而此與前述柳氏田園詩中時見憂思的創作現象彼此相契。

五、夢田與困境：陶、柳歸田書寫的交集與異趨

藉由上述對於陶淵明與柳宗元辭賦所呈現的歸田書寫，固然兩人皆分別運用辭賦善於鋪陳與虛擬的一貫筆法，巧妙地勾織出他們對於未來生命前景的想望或藍圖，而且其中婉轉卻又深刻地映射為兼具夢幻色彩與焦慮意涵的共同創作取向，從而在歸田辭賦書寫上別具重要意義的里程碑。然則在陶、柳二者的此一共同面向之外，卻也不乏同中有異之個別取向，從而展現為彼此交集之外的異趨性。

陶淵明〈歸去來兮辭〉固然不乏作者於將歸未歸之際，對於田園生活的抉擇與憧憬，然則對於數度折返於仕、隱之間的陶淵明而言，此後未再涉足仕宦場域，並在其詩作中高吟「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⁷⁰展現為執善而從與果敢堅毅的生命姿態。其本質上為自我內在精神判斷及其取捨的主動性，由此基點前進出發的田園生活，無疑應視為作者幾番出入於仕、隱之後，針對士人生涯規劃與生命省思的最終確認。且這一士人生命路向的鎖定，陶淵明或許不無內心的掙扎，但一旦確定了未來的方向，其終將歸返田園的姿態，不能不一一具現為〈歸去來兮辭〉中「悟以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的澄明心境，與「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乃瞻衡宇，載欣載奔」、「雲無心而出

68 參見林紓，《韓柳文研究法》（臺北：廣文書局，1976），頁68。林紓謂：「閔生一賦慮，吾生之莫保也。入手以生逢險阨之故，喪志逢尤，則自承己過已。……均無可奈何，此是得罪以後，聽人指摘，無可自辯處。……因是沈抑不舒，但有自慙，語雖尤人，仍是引過。……心既無他，竟為遷客。登高岳，瞻故邦，咸有戀闕之意。……一身孤危，則生之可閔極矣，故曰：慮吾生之莫保兮。」

69 參見方介，《韓柳新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9），頁223-246。

70 參見陶潛，《飲酒二十首并序》，《陶淵明詩箋證稿》，頁273。

岫，鳥倦飛而知還」的瀟灑出塵之姿。⁷¹ 因此，對於陶淵明而言，以〈歸去來兮辭〉為代表的歸田書寫，其中固然不乏深層的仕宦焦慮，然則從另一方面而言，亦別具有超越困境的創作意蘊。由此觀照其田園歸返的書寫旨趣，一方面既在辭賦工於鋪陳美化的筆觸中，重塑其未來的生命藍圖；同時卻也凸顯出其藉由田園歸返書寫所投射的樂園意識，⁷² 因此田園生活對於陶淵明是一種眼前可以立即展開並付諸踐履，甚且追尋、沈緬的夢田，這一世界不僅可以擁抱、耕耘，以至於等待收穫。據此對照於陶詩〈歸園田居〉的歸耕實際，〈歸去來兮辭〉儘管不乏鋪陳、美化的鑿痕，及其夢幻書寫的侷限性與片面性，然則田園歸返基本上卻豐富具備了主動抉擇與樂觀實踐的能動色彩。

相對於陶淵明〈歸去來兮辭〉焦慮指涉與困境超越雙重意涵的創作實質而言，柳宗元的〈夢歸賦〉顯著地運用一種純粹的夢寐實境。就其夢境書寫內容及其旨趣而言，顯然與陶淵明〈歸去來兮辭〉互有出入。首先，在本質上陶、柳二者所展現的夢田書寫，固皆不失擺脫困境與追尋樂園旨趣，然則陶賦中昂揚揮灑的追夢神態，在柳氏〈夢歸賦〉則映射為深具愁苦顛沛的沈重步履：

上茫茫而無星辰兮，下不見夫水陸。……橫衝颿以蕩擊兮，忽中斷而迷惑。……進招悵而不得。……忽崩騫上下兮，聊按行而自抑。……山嵒嵒以巖立兮，水汨汨以漂激，魂恍惘若有亡兮，涕汪洋以隕軼。⁷³

柳宗元這一段夢田歸返書寫，若與陶淵明〈歸去來兮辭〉中同樣敘寫的歸途風景與心境對讀，則清楚映現為人間樂園與幽黯國度的強烈情境落差。換言之，陶氏歸田樂園書寫呈現為當下困境的告別本質；反之，柳氏歸田夢境敘寫，則呈現為一種重現眼前困境的文學隱喻，而其具體實質則是一種貶謫困境的焦慮象徵。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陶淵明藉由〈歸去來兮辭〉裡的夢田歸返，主動地超越長久以來出入隱、仕邊界的精神困境，具現為自由、主動、樂觀的生命情懷取向；然則柳宗元的〈夢歸賦〉則不由自主地深陷於永州山

71 上引三處原文參見陶潛，〈歸去來兮辭〉，《陶淵明集校箋》，頁266-267。

72 參見拙文，〈漢魏六朝詞賦中的田園書寫及其樂園論述〉，《第四屆漢代文學與思想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2003），頁161-192。

73 參見柳宗元，〈夢歸賦〉，《柳河東全集》，卷2，頁27-28。

水所禁錮的貶謫國度，而其精神姿態直如一身陷囹圄的羈囚，從而映現為囚禁、被動、悲觀的生命困境。於是陶淵明賦中所預擬的夢田，隱含精神樂園的美麗誘引與仕、隱困惑的永恆跳脫，而其敘寫型態則呈現仕宦場域與田園世界涇渭分明的生命進程；反之，柳宗元的夢田歸返，儼若地獄囚徒的天堂幻夢，渴望找尋出路，卻又不得其門，茫昧幽黯的處境，呈現為沮喪挫折的悲觀傾向，誠如柳氏〈囚山賦〉所述：

攢林麓以為叢棘兮，虎豹咆嘯，代狴牢之吠嗥，胡井管以管視兮，窮坎險其焉逃，顧幽昧之罪加兮，雖聖猶病夫嗷嗷，匪兕吾為桎兮，匪豕吾為牢，積十年莫吾省者兮，增蔽吾以蓬蒿，聖日以理兮，賢日以進，誰使吾山之囚吾兮滔滔。⁷⁴

因此〈夢歸賦〉的夢田歸返，更凸顯出柳宗元田園歸返，徒然是一場遙不可及的漫漫長路，這一點從〈夢歸賦〉夢醒驚愕一段所述：「鐘鼓喤以戒旦兮，陶去幽而開寤，會爵蒙其復體兮，孰云桎梏之不固，精誠之不可再兮，余無蹈夫歸路」可證。⁷⁵然則所謂「余無蹈夫歸路」透露出對於歸返之路的濃厚夢幻取向及其難以落實履踐的虛幻本質，而其主要敘寫型態則具現為歸返之途的重重險阻與歸田生活的難以開展，對照於陶淵明〈歸去來兮辭〉大肆鋪陳的田園生活圖景，形成敘寫取向的顯著對比。其次，陶賦的夢幻主要映現為對於田園藍圖的樂觀預擬，並對照出仕生涯的錯誤與迷惘，於是賦篇美麗的鋪陳與想望，成為陶賦夢幻色彩的主要體現，這與柳賦中直接訴諸夢寐形式的創得意蘊，自然同中有異。陶賦夢田呈現為實中有虛的美麗鋪陳，相形之下，柳賦則映射為虛中有實，並具現為夢田難企的虛浮幻滅及其當下的困境事實。再者，柳宗元的夢田歸返書寫，與陶淵明賦的另一差異，還在後者展現對於仕宦場域的毅然告別，然則柳宗元的歸田書寫，其終極關懷則是歸向以長安京邑為代表的仕宦場域。易言之，陶賦的夢田是以田園本身為直接依歸；柳賦的夢田，則以都邑為主要情志歸宿，至於其間歸田書寫則成為迂迴暗示的情志隱喻。這些皆一一顯示出陶、柳賦裡歸田書寫，於夢幻與焦慮等交集面向之外的異趨所在。

74 參見柳宗元，〈囚山賦〉，同上註，頁29。

75 參見柳宗元，〈夢歸賦〉，同上註，頁28。

六、結 論

綜合上述陶淵明〈歸去來兮辭〉、柳宗元〈夢歸賦〉及其相關詩文的相關考證，對於由屈〈騷〉開始並引領的歸返書寫，既是辭賦發展史上重要的書寫主題之一，同時也成爲後代辭賦歸返論述的原始基調。基於傳統士人的道德認知，屈原、陶淵明、柳宗元三人的歸返論述，適成爲與掌握權力大柄的治統間，一種深具對話意涵的自我表態。然則三者的姿態不盡相同，〈離騷〉近於申冤，鏗而不捨；〈歸去來兮辭〉不乏抗辯，選擇絕交；柳宗元〈夢歸賦〉則如泣如訴，憂思寓夢。此外，陶、柳辭賦雖皆具現爲歸田之姿，但由於「家」、「國」背後公義、私情領域意涵之合流、分際有異，陶淵明的田園歸返，書寫「去國」意涵；柳宗元筆下的歸返，則涵蓋歸家與返京的雙重意蘊，從而呈現出屈〈騷〉歸返的轉換與回歸。

其次，陶、柳二人辭賦雖皆承傳屈〈騷〉、張衡〈歸田賦〉以來的歸返書寫，然亦呈現爲詩、賦合流的文類書寫嬗變。但兩者的具體書寫策略亦各有不同。陶淵明〈歸去來兮辭〉序文與正文結構上的憂、樂對比，適與其田園詩作中的苦、樂互見相映成趣。然則就柳宗元而言，其〈夢歸賦〉幾乎不見類似陶氏〈歸去來兮辭〉的愉悅書寫，反之，在如泣如訴的夢境中鋪陳，焦慮不時可見，這與柳宗元〈田園三首〉、〈首春逢耕者〉、〈飲酒〉等濃厚沿襲陶氏田園書寫作品中的情形大體契合。換言之，柳宗元賦中的歸返書寫，仍是以憂思爲其基調；然則陶、柳辭賦的歸田書寫，固然各自採取不同的具體書寫策略，但兩者辭賦的歸返書寫，本質上皆不外是一種深具士人文化意涵的焦慮論述。二人或明或隱的皆承傳了屈〈騷〉以來，以夢幻型態爲主的基本論述樣態。但細繹兩者之別在於陶淵明〈歸去來兮辭〉，在樂園預擬中注入夢幻質素，以消解其眼前的仕宦焦慮，卻同時延展並啓動生命中仕宦焦慮的另一階段，陶氏稍後撰成的〈士不遇賦〉，適成爲此一仕宦焦慮的重要具現；至於柳宗元〈夢歸賦〉的夢境本身，除映襯爲異於陶之「願望滿足」式的另一「焦慮夢」類型外，對於其具體的焦慮取向而言，柳宗元辭賦裡的歸夢書寫，雖亦關涉陶淵明的「仕宦焦慮」，但實際上則更集中表述其南貶永州，不得歸返的「謫囚焦慮」，而柳氏同撰於永州時期的書信、詩文，尤其像

〈懲咎賦〉、〈閔生賦〉、〈囚山賦〉等等辭賦，都一一透露箇中消息，並揭示〈夢歸賦〉裡所隱含的「謫囚焦慮」底蘊。此即為陶、柳兩者焦慮書寫的同中有異。其次，就歸田敘寫而言，陶淵明賦展開一場自由、主動、樂觀的生命抉擇及其困境超越，然則仕宦場域的斬斷與揮別，留下的卻是傳統士人終極生命焦慮的見證與省思；相形之下，柳宗元賦則富於囚禁、被動、悲觀的精神掙扎及其困境淪陷，而且表面上與陶淵明形似的歸田書寫，其實質上乃逆轉為重返仕宦場域的內在指涉。這些映射出陶、柳賦裡歸田書寫基本交集之外的異趨面向。綜上而觀，陶、柳辭賦裡的歸返書寫，上承屈〈騷〉、張衡〈歸田賦〉之外，固然各自有所損益因革，但卻依此延展出辭賦史上，結合與建構歸返、夢幻、焦慮三者合一的論述主題與書寫意蘊，從而應對於考察中國文學裡歸田書寫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先秦·屈原等撰，宋洪興祖注，《楚辭補注》，臺北：長安出版社，1991。
 先秦·孔子，潘重規注，《論語今注》，臺北：里仁書局，2000。
 漢·陸賈等，《全漢賦》，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
 漢·張衡，《張衡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唐·柳宗元，《柳河東全集》，臺北：世界書局，1988。
 晉·陶淵明，王叔岷箋證，《陶淵明詩箋證稿》，臺北：藝文印書館，1975。
 晉·陶淵明，楊勇校箋，《陶淵明集校箋》，臺北：正文書局，1987。
 南朝·劉勰，《文心雕龍》，臺北：金楓出版社，1987。
 梁·蕭統編，李善注，《昭明文選》，臺北：五南書局，1991。
 梁·鍾嶸撰，汪中注，《詩品》，臺北：正中書局，1990。
 北宋·歐陽修，《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86。

二、近人論著

- 王國瓔 1999 《古今隱逸詩人之宗——陶淵明論析》，臺北：允晨文化公司。
 王夢鷗 1984 《古典文學探索》，臺北：正中書局。

- 王國安 1993 《柳宗元詩箋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方 介 1999 《韓柳新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 余冠英注 1992 《詩經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 林 紓 1976 《韓柳文研究法》，臺北：廣文書局。
- 馬積高 1998 《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許東海 2003 《漢魏六朝詞賦中的田園書寫及其樂園論述》，《第四屆漢代文學與思想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頁 161-192。
- 袁行霈 1997 《陶淵明年譜匯考》，見氏撰，《陶淵明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陳怡良 1993 《陶淵明之人品與詩品》，臺北：文津出版社。
- 葛曉音 1993 《山水田園詩派研究》，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
- 錢鍾書 1989 《談藝錄》，臺北：書林。
- 鍾優民 1991 《陶學史話》，臺北：允晨文化公司。
- 簡宗梧 1998 《賦與駢文》，臺北：臺灣書店。
- 羅聯添 1981 《柳宗元事蹟繫年暨資料類編》，臺北：國立編譯館。
- Freud, Sigmund (佛洛伊德) 著，吳康譯 1998 《精神分析引論新講》，臺北：桂冠圖書公司。
- Freud, Sigmund (佛洛伊德) 著，呂俊、高伸春、侯向群譯 2000 《夢的解析》，臺北：米娜貝爾出版公司。
- Horney, Karen (卡倫·霍爾奈) 著，雷春林、潘峰譯 1999 《精神分析新法》，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

Returning, Dreaming, Anxiety: The *Guitian* Tradition and Works by Tao Yuanming and Liu Zongyuan

Tung-hai Hsu *

Abstract

Guitian (歸田, return to the fields)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hemes i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was traditionally used by writers as a vehicle for expressing their thoughts and ambitions. As such works in the *guitian* tradition can provide us with a mirror on the inner life and view of self of these authors.

Works by Tao Yuanming 陶淵明 and Liu Zongyuan 柳宗元 using this theme (i.e. *Guiqulaici* 歸去來兮辭 and *Mengguifu* 夢歸賦) and other related pieces combine to make up an important stream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ifu* 辭賦 literary tradition that was started and fleshed out by Qu Yuan 屈原.

The fact, though, that Liu Zongyuan's work differs fundamentally from the style of other works in this tradition makes it necessary for us to reconsider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literary discourse and the deeper meaning of Tao Yuanming's work. As such, Liu's work can give us an important vantage point from which to view this tradition and points to the unity in the *guitian* tradition of the motifs of returning, dreaming, and anxiety. This unity of motifs in turn allows us to see more clearly the major structural elements and discourse that are involved in works in the *guitian* tradition and is a valuable reference for

* Tung-hai Hsu is a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at the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exploring this important literary theme.

Keywords: poetry, Tao Yuanming 陶淵明, Liu Zongyuan 柳宗元, Qu Yuan 屈原, returning to the fields